

# 书 评

## 文化变迁与主体能动——读吉迪《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sup>\*</sup>

林永昌

（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波士顿，02138）

在文化变迁过程中，考察物质文化背后的象征符号如何被利用、改造来应付生活之需，是当下有关文化交流和跨地区贸易考古学研究中的核心<sup>[1]</sup>。这一问题在中国北方地带，即长城地带以西以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尤为突出，因为该地带处于东西亚交流的必经之路，人群移动与考古学文化的变动相对频繁。吉迪最近的研究《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公元前一千年间身份标识的形成与经济转变的考古学观察》所提出的学术目标，正好与此潮流不谋而合。该书对北方青铜器和北方地带游牧经济的形成提出了不少崭新的想法，在方法论上也有甚多独特建树，值得对以上问题关注的学者重视。

该书大体由4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和第2章，主要针对书中涉及的游牧经济和族群认同问题，梳理了相关理论，并介绍与本书相关的地理环境和考古学文化谱系，为后面的讨论铺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在讨论我们所熟悉的“族属”（ethnicity）问题时，使用了“类族群”（ethnic-like identity）这一新名词来取代“族属”，原意是针对过去研究中简单机械地将考古学文化与文献所提及的“族属”（例如东胡）对应，以新名词来区别不同的研究方法与对象。第二部分，即该书的第3章，主要回顾了北方地带与游牧经济形成相关的动物、石器资料以及遗址景观的历时性转变。

---

<sup>\*</sup> 该书原版出版于2009年，见Gideon Shelach. *Prehistoric Societie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China: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Identity Form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During the First Millennium BCE*[M]. London and Oakville: Equinox Publishing Ltd, 2009. 中文版已于2012年出版，见吉迪著，余静译. 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公元前一千年间身份标识的形成与经济转变的考古学观察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另外，本书评中的引文皆出自原书的英文版。

第4章为本书的第三部分，主要讨论如何通过各种统计方法分析墓葬中随葬品所表达的各种身份，并在具体的考古学例子中确定随葬品所表达认同感的侧重所在。本书的第5章和结语是最后部分，重点讨论了人群移动、贸易、世界体系等理论对解释北方地区文化变迁的适用性和新的“类族群”认同及经济结构如何形成。通过对比多重的证据，该书最后的观点认为：游牧经济的转型是渐进式的过程，且很大程度上是与意识形态相关。由于受到中原地区诸国的北进压力，本土族群感形成并触发了该次文化转变。通过与欧亚草原其他人群的互动，不少新的符号被借用来表达这种新的认同感，从而形成了新的考古学文化。举一个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例子：吉迪所提出的转变模式就和当下汉堡与快餐店的流行有点接近，它们在社会上的大行其道可能更多与“新潮”“时尚”有关，从而成为了新的自我标识，所以深受年轻人的欢迎，但对此趋之若鹜的年轻人却不一定因生活忙碌才非去快餐店不可。

由于该书的视角不同于以前的研究，很多跟文化转变相关的新想法都甚具启发性。首先，该书批评了过去研究以“文化生态论”和“文化史”为主，对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不加批评便任意接受。简单来说，这些研究的共同前提是：环境或者生态因素往往是社会转变的主要驱动力，而考古学文化的演变则被简单归结为人群移动或者是扩散的产物。在第3章中，吉迪仔细、系统地梳理了该地区与社会生产和消费相关的考古学证据和古环境的资料，但结论却与之前的大有不同。他指出，大约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禧年之际，游牧经济的转变是相当缓慢的过程，没有证据能表明在这一时间段内发生过重大的环境转变。此外，在第5章中，吉迪以为由于北方地带、欧亚草原以及中原核心区之间技术或者知识等多方面的互动，最终才导致了新的物质文化出现。为了克服以生态决定论与文化史为主导研究模式的缺陷，吉迪指出，我们应该更重视创造物质文化主体的能动性，并尝试找出器物所表现的身份认同感。在该书中，吉迪将文化变迁视为本土人群主动选择的结果（第69页）。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他提出了有别于前人的新观点。例如，经济模式的转变不单有助人群适应新的环境，而且在从中原而来的压力下，新的经济模式也提供了建立群体新的共同认同感的基础（第71页）。此外，在墓葬中器物或衣衾的摆放方式和位置往往是辨认特意表达的身份认同与文化价值观的关键所在（第101页）。这一点就和在西周墓葬研究中通过腰坑、殉牲与头向来辨认殷遗民和非姬姓族属的原理相似，只要对商周考古的问题有一定了解，两者研究思路上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

本书在研究文化变迁时，高举所谓“主体”的旗帜，提供了不少分析资料的新视角，但同时也有若干问题值得再三斟酌。这些问题包括：①新的身份认同与社会经济关系；②各种身份认同之间的内在关系；③文化选择与器物内在特性的关系。在以下部分将逐一剖析这些问题。

第1个问题与吉迪在第3章中对经济生活方式转变的新认识有关。他反对环境决定

论，主张是人的主动性，或者说“社会模式”（第66页）是转向畜牧经济的关键所在。简单地说，吉迪以为食谱具有团结人群的力量，当人群开始食用新的食物品种（如奶和肉）时，新的饮食习惯便塑造出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感（第71页），最终促成了经济模式的转型。当然，根据当下较流行的理论观点，实践确实可以加强并提供强化结构的力量<sup>[2]</sup>。但反过来看，结构同样会影响实践而且两者也是相互影响<sup>[3]</sup>。所以新的饮食习惯与经济模式就好像是蛋与鸡之间的关系，人对食物的选择与环境或经济方式转变的逻辑关系如何，到底孰先孰后，其实需要更多的考古学证据去支持。尤其是在考古学资料所允许的时间尺度下，是否能观察到两者一早一晚的关系，两者又如何相互影响，也值得对资料更仔细的分析。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吉迪认为，游牧经济是后来当地人群有意地增添到原来农业经济结构中的新模式。但畜牧经济本身并非可一蹴而就，牧民需要具备相对专业的知识，包括如何照料羊群和利用轮牧来充分利用周边资源等技术。这些知识很可能是一般的农业社会、特别是之前从未接触过该类牲畜的社会所不具备的。将经济模式的转变看作是在旧有基础上新模式的“增添”，不禁令人怀疑是否对实际的社会转变过于理想化。由于在该书中并未对转变所需的条件做进一步细究，“社会模式”对于解释经济生活的转变也不见得一定比受环境制约的模式更可信。

第2个问题主要与第4章的身份认同分析相关。本章的技术路线主要依靠统计学的方法，例如因子分析、K均值分类方法以及等级聚类方法等探讨随葬品的种类与所反映的认同感间的关系。他认为，每一类随葬品在墓葬中都表达某一种认同感，包括威望、性别、军事和“类族群”等。例如，在北方地带的殉牲、所穿着的衣服或头饰以及铜牌饰往往表达了人群所共享的“类族群”认同，以此来标识自我并区别于南方中原地带的异邦人群（第110页）。所以吉迪与以前观点不同处在于：他以为北方青铜文化的出现并不能归结为草原族群扩散的结果。相反，生活于这一区域的群体在构成上可能并未改变，只是使用了不同的一套物质文化而已。不过，吉迪并没有详细地解释到底这些认同感是否会相互交叉影响。他仅强调，个别的观念应该是自成体系，不受其他的干预。譬如说，性别认同感应该与威望高低的影响无关，因为墓葬中与等级威望相关的随葬品和表达性别认同的物品一起出现的情况不多。或者简单地说，男性与女性都有机会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吉迪指出个体在同一时间内可能具有多重身份认同是十分正确的。不过，该章所用的统计方法较复杂，加上篇幅所限，未能逐一细加说明，对于不清楚统计学的读者来说，要理解这一章中细节的操作方法会相当吃力。与此相关的是，在统计前随葬品首先要经过人为的分类，但每项分类是否恰当却值得商讨。例如该章中涉及三类青铜器：青铜牌饰、青铜装饰品以及青铜小件（第95页），在统计时是分作三类物品来处理，但它们到底是三类不同的随葬品，还是应该算作是同一类物品（如“青铜器”）呢？此外，我认为各种认同感相互独立的假设仍需再加思考。其他学者已曾指出“性别往往是

与其他的身份标识如年龄、阶层、族属、社会性(sexuality)等相关”<sup>[4]</sup>。在考古学中也不乏相关例子。再以西周时期的材料为例,高等级的贵族夫人很可能大部分来自不同于其夫君的族群(所谓的“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以在并穴合葬墓中,女性墓葬多随葬个别风格迥异的随葬品,或者在葬式上与其夫君不同。换句话说,族群很可能同时与性别、等级有密切的对应关系。同理,其他的认同观念也当如此。该部分的统计分析还涉及另外的问题。当讨论到具体的认同感例子时,不同的种类有时很难准确地区分,军事性以及“类族群”这两类观念恰好如此。以各类兽首或环首刀及青铜牌饰为例,这两类物品在北方地带分布甚广,也多在同一座墓中被同时随葬(129页),吉迪以为这两大类物品可能代表了上面提及的两种不同身份。但为何我们以为是不同种类的随葬品就一定代表不同的认同感?既然这两类物品往往共出,又与草原文化有关,是否说明两种身份认同在现实中的区分其实相当模糊?又或者,当地人群是否可能通过使用、随葬包括兵器在内不同种类的物品作为标识族属的主要手段?在分析随葬品所代表的身份认同时,如果预先假设了古人把各种不同的身份都区分得一清二楚,结论可能会与当时真实的情况相距甚远。

第3个问题则涉及该书(特别是第5章)所提及的身份认同与物质文化相关的问题。北方系青铜器,特别是东周时期的器类与纹饰深受草原文化的影响已是学界共识。根据吉迪的看法,由于跨区域、大规模的人群或文化交流可能促使北方地带各族群成员采用“舶来品”(即北方系青铜器)来加强联系并在“联结各族同时标识出彼此身份的特点”(第144页)。换句话说,这一观点主张服饰、青铜牌饰以及武器等“舶来品”(第145页)的随葬与使用成为了“同一阵线”成员共同的身份标识。该观点原理上是相当合乎情理的。不过,就更深一层的意义而言,却并没有太有力地说明为何恰好是这些物品,而非其他的物品(如陶器),在众多的选择中被用来标识“类族群”认同感。事实上,人类并不是随意地选择物质文化来表达意思。例如,在南美安第斯的金属制作传统中,主要流行锻打青铜合金然后再镀上金银。这种工艺传统从查文文化(公元前900~前200年)开始出现,到印加帝国(约15~16世纪)时更为流行。因为不同的金属在印加时期可能被赋予不同的社会等级含义:金代表印加国王,银代表有王族血统的贵族,而铜则代表平民。所以铜器的制作恰好表现了现实的政治构成:国王是高高在上,但同时平民则是社会的主体<sup>[5]</sup>。正因如此,金属器的制作在印加时期大行其道。也就是说,“舶来品”可能并不足以充分说明对文化载体的选择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内在关系。如果能再仔细地考察北方地带物质文化中更具体或者更基本的元素(如动物的主题图像)与认同感建构的联系,也许能找出更多解释文化转变的动因。

不能否认的是,吉迪的新著作说明了解释文化变迁时对主体关注的重要性,同时也展示了如何从不同角度解释材料的新方法。从方法论来看,该书可以说是探讨北方地带青铜文化变迁的里程碑之作。不过,正如本文所阐述,对主体的研究需要关注现实社

会与环境中的各种条件，同时也要在可把握的年代框架内搞清楚考古学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另外，如果分析能更深入地探讨统计数字背后物质文化的特性，并考察随葬品所表现各种认同感之间的关系，相信对文化变迁的解释会更具说服力。

### 注 释

- [ 1 ] Stein, G. J. From Passive Periphery to Active Agents: Emerging Perspectiv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2, 104(3):903-916.
- [ 2 ]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M]. Translated by R.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20.
- [ 3 ] Hodder, I., and S. Hutson. *Reading the Past: 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rchaeolog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90.
- [ 4 ] Meskell, L. The Intersections of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Archaeology[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02, 31:279-301.
- [ 5 ] Lechtman, H. Afterward. In M.-A. Dobres and C. R. Hoffman (Ed.), *The Social Dynamics of Technology: Practice, Politics, and World Views*[C].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9:223-232.

## **Cultural Change and Agency: Review on Prehistoric Societie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China by Gideon Shelac**

Lam Weng Cheong

This is a book review of Gideon Shelach's latest work *Prehistoric Societie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China*. The review consists of two major parts. First, it summarizes and introduces Shelach's new ideas about the change of subsistence economy toward the pastoral-nomadic model and formation of new ethnic-like identities in Northern Zone during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based upon his archaeological studies on settlement pattern, lithic tools, palaeoenvironment, faunal and botanic remains, etc. Second, the review discusses several issues in the new work that are worthy of a closer study including: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ation of new identity and subsistence change; 2)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identities; 3) intrinsic natures of materials cultures that are embedded in cultural choices.